

國家與公民社會在轉型正義工程的協作：  
以德國之聯邦處理德國統一社會黨獨裁統治基  
金會及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為例

陳冠瑋

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專案助理教授

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本版本為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刊載使用，引用請註明出處)

## 目次

### 壹、 導言

### 貳、 德國兩基金會簡介

#### 一、 聯邦處理德國統一社會黨獨裁統治基金會 (SED 基金會)

(一) 設立與營運基礎

(二) 主要工作

(三) 近期發展

(四) 小結

#### 二、 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 (EVZ 基金會)

(一) 設立與營運基礎

(二) 主要工作

(三) 近期發展

(四) 小結

### 參、 協作之實踐方法

#### 一、 兩基金會之「串連」角色

(一) 主動

(二) 被動

(三) 主動與被動融合

#### 二、 具體方法：協作工具箱建構

(一) 行動協作

(二) 教育與推廣之協作

(三) 受害者支持之協作

(四) 數位時代之協作新嘗試

### 肆、 從德國兩基金會經驗看協作之可能與挑戰

一、 協作之意義與可能性

二、 協作面臨之挑戰

伍、 結語

參考文獻

## 壹、導言

新興民主政府設法面對過去威權體制，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工程 (Teitel, 1997: 2009 ; 吳乃德, 2006:1 ; 陳俊宏, 2015:1) 。而從這樣的描述，可以見得政府作為國家的代表，在這樣的「善後工作」裡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然而，轉型正義涉及的層面往往跨越社會的不同面向與群體，而公民社會的參與在轉型正義工程中也誠屬不可或缺，不僅發揮推動力、亦貢獻於其發展與深化 (Duthie, 2009: 5 以下 ; Werle and Vormbaum, 2022: §1.3.4) 。從台灣的經驗而言，亦是如此 (如：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2015) 。

然而，國家或公民社會作為轉型正義的推動者，各有其優勢與挑戰。一方面，由國家推動的轉型正義工程，具備法政策的制度化、資源支持、統一性與一致性等優勢，但也面臨政黨對立、權力集中而缺乏多樣性、利益團體抵制、實施之困難與不完全性等挑戰。儘管國家行為者引領之轉型正義一直是轉型正義的核心主題 (Backer, 2003) ，但國家在轉型正義中的角色究竟為何，始終不是能簡單回答的問題，轉型正義和與國家和國家之機構的關係如何，近年也成為學術反思的議題 (Gready, 2019) 。實則，即使國家具備推動制度性改革之優勢，其行動的侷限性與可能之爭議也促使我們思考，如何將其他行動者妥適地納入轉型正義治理與實踐的框架之中。

另一方面，公民社會雖然可容納多元聲音、具備更多彈性與靈活應變等可能，惟資源的穩定性與其影響力是其不容忽視之挑戰。事實上，轉型正義的理論中，早期經常忽略對公民社會角色的系統性研究 (Backer, 2003) 、或將公民社會的概念簡化為人權非政府組織，用以填補政府作為的空白，而忽視了「政治參與者的社會運動」的面向 (Gready and Robins, 2017) ，也因此欠缺了公民社

會在形塑轉型正義過程可以發揮如何之功能的完整認識。然而，隨著理論與實踐的討論進展，文獻也逐漸關注到公民社會在轉型正義中的角色（Duthie, 2009）、並在近年重新思考公民社會的組織、行動與跨國方法（Gready and Robins, 2017）。具體而言，對公民社會在轉型正義脈絡中重視的興起，可能來自於對傳統上僅強調國家行為者的不足（如：Backer, 2003）、也可能來自於對於公民社會方法本身的重新理解（如：Gready and Robins, 2017）。從這些發展可見，公民社會不僅是一種對國家行動的「補充」，其作為制度參與者與價值倡議者的潛能，也逐漸被納入轉型正義工程之討論視野。

那麼，問題便是，國家與公民社會在轉型正義工程中的關係為何？是否可能有具體的「合作方式」，以達成雙方特點之互補、更有利於推進目標？對此一問題的初步回應，可能侷限於傳統模式：由國家提供資金補助供申請、或是委託執行特定計畫等想像或實務理解。然而，本文基於對德國與轉型正義任務相關的兩基金會——聯邦處理德國統一社會黨獨裁統治基金會（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下稱 SED 基金會）<sup>1</sup>及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下稱 EVZ 基金會）<sup>2</sup>之運作經驗觀察，期望提出一種「協作」模式的可能，深化台灣對於轉型正義工程中不同角色關係之討論，拓展更多實踐方向。

實則，本文所稱之「協作」，不限於傳統資金補助或委託執行

---

<sup>1</sup> 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https://www.stiftung-aufarbeitung.de>（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3月1日）。

<sup>2</sup> 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 (EVZ). 2024. <https://www.stiftung-evz.de>（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3月1日）。

關係，而係指政府與公民社會間共同就轉型正義目標、執行與責任進行的持續性互動模式。而這樣的理解與方法，對目前已進入「後促轉會時期」的我國而言，尤有意義：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作為「任務機關」，運作期間由政府主導法定任務之進行，於 2022 年 5 月 30 日解散後，後繼工作主要由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法務部、內政部、文化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國家發展委員會等組織銜接。

換言之，在促轉會的任務「告一段落」後，曾由專責機關在限期內引領的轉型正義工程，已成為國家常態推動的政策任務，其如何持續、並在下一階段有意義地運作，公民社會的角色即相當重要。亦即，國家和公民社會在此階段如何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推動轉型正義之落實與深化，使民主政體面對過去也面向未來，是台灣當前面對的關鍵挑戰之一。

也正是基於這樣的重要性，本文認為，德國兩基金會的經驗，作為同樣是常態運作的轉型正義（或稱記憶文化）組織，其經驗值得我們反思、提煉，並作為探索自身可能之啟發。在此，也須強調的是，有鑒於兩國的歷史脈絡、社會文化、與實踐經驗差異，本文絕非提倡無保留地複製德國經驗，而是希望透過提供對兩基金會工作方法之分析，探索「協作」模式的可能性，並提供未來思索我國如何在地實踐「協作」的基礎資訊。

具體而言，SED 基金會和 EVZ 基金會究竟何以成為本文關注之對象？兩者雖分別處理不同歷史階段與性質的轉型正義課題，然皆以制度化的形式，長期參與國家記憶工程與歷史正義的推動，並在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扮演樞紐與橋樑角色。特別是，這兩個基金會不僅作為「資源分配者」，更積極扮演「協作促成者」的角色，主

動規劃或發起跨部門、跨領域、跨世代的行動平台，例如串連學界、教育界、受害者團體與青年組織，共同設計出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推廣模式，進而深化轉型正義的社會紮根。而其共同特色在於：皆為德國聯邦立法所設之公法基金會，具有一定程度之自主性與中介功能，能在穩定的制度架構下發揮延續性與協作性。這使其能夠作為一個有效的制度節點，在上（國家政策）與下（民間倡議）之間建立信任、轉譯政策意圖、放大公民行動之聲，成為民主深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角色。對外亦展現出德國處理歷史責任與民主鞏固之制度實踐樣貌。

因此，本文透過兩基金會的對照分析，試圖勾勒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形塑協作關係的可能模式。也應先敘明的是，由於我國目前推動轉型正義相關之法定組織上，和德國容有差異，以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而言，即非以這類公法基金會之形式，而仍為行政部門架構下之單位，此點差異應先予辨明<sup>3</sup>。

綜合以上，本文將立基於與德國兩基金會相關之官方資料與學術文獻分析，以下述架構開展：在「貳、德國兩基金會簡介」扼要地爬梳 SED 基金會和 EVZ 基金會之成立背景與法源基礎，並著重於基金來源、國家角色以及其主要工作；繼而於「參、協作之實踐方法」透過辨識兩基金會「串連」之角色，分析其具體的工作方法，包括不同類型的協作；其次於「肆、從德國兩基金會之經驗看協作之可能與挑戰」，統整性地分析並提出本文對於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協作」模式之見解與建議，亦包含仍須面對之挑戰；最後於「伍、

---

<sup>3</sup> 不過，以公法基金會或類似之組織形式而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是行政院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於 1995 年 10 月設立的公設財團法人機構，創立初期工作重點在於處理對二二八事件的賠償、紀念活動與撫慰，2009 年起經營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也同樣承載了處理機制之轉型、往後之紀念等任務。相較於德國兩基金會的關懷範圍，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處理的面向主要仍以二二八事件為主。不過，相信德國兩基金會之行動也可帶來些許映照與對話的可能。

結語」作結。透過上述架構，本文希望透過德國兩基金會的經驗，為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提供有關「協作模式」的想像——包括政府如何支持民間推動轉型正義工作的持續創新與穩定發展，以及公民社會如何回應並回饋公部門的政策與措施，以對我國未來之實踐提供些許啟發。

## 貳、 德國兩基金會簡介

SED 基金會與 EVZ 基金會分別成立於 1998 年與 2000 年，雖其任務範疇各異，然皆為德國聯邦議會立法設置之公法基金會，目的在於處理非民主統治之遺緒，並建立可持續的歷史記憶與民主教育及資源平台。透過下列整理，本文將從兩基金會的成立背景、法源基礎、基金來源、國家角色、組織架構與實務作為等層面進行說明，並進一步指出其在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所發揮的「橋樑功能」，為後續討論協作機制奠定基礎。

### 一、 聯邦處理德國統一社會黨獨裁統治基金會（SED 基金會）

#### （一） 設立與營運基礎

SED 基金會設立於 1998 年 6 月，依據聯邦議會通過之《聯邦處理德國統一社會黨獨裁統治基金會法》（Gesetz zur Errichtung einer 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SEDDiktStiftG）正式成立<sup>4</sup>，回應 1992 年與 1995 年聯邦議會兩次「對德國分裂與統一之處理」（Aufarbeitung der deutschen

---

<sup>4</sup> 討論經過參照：12.02.1998, 1. Beratung BT-Plenarprotokoll 13/219, S. 19981A-19981A; 02.04.1998, 2. Beratung BT-Plenarprotokoll 13/227, S. 20876A-20884A; 02.04.1998, 3. Beratung BT-Plenarprotokoll 13/227, S. 20883D-20883D; 08.05.1998, Durchgang BR-Plenarprotokoll 725, S. 230C-230D.

Teilung) 調查委員會之建議 (Eppelmann, 2000) <sup>5</sup>。SED 基金會的主要目標，在於針對德國前東部地區，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DDR) 與其前身蘇聯佔領區 (SBZ) 期間的獨裁統治進行歷史清查、教育推廣與學術研究，並強化全國性民主記憶文化之建構<sup>6</sup>。

SED 基金會屬於公法基金會 (Stiftung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由聯邦政府提供穩定財源支持，初期基金來自對東德前執政黨——德國統一社會黨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 資產的回收與處置，並由德國聯邦政府文化與媒體事務專員 (Beauftragte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Kultur und Medien, BKM) 列入年度預算資助<sup>7</sup>，因此，其經費來源具備公共性與象徵性。然而，該基金會依法獨立運作，其運作制度亦保障其自主性與公信力。

組織架構方面，基金會設有董事會 (Stiftungsrat)、執行委員會 (Vorstand) 與執行辦公室 (Geschäftsstelle)。董事會為最高決策機關，成員來自聯邦議會各政黨、聯邦政府部會代表、學界專家、受害者組織與民間社會代表，體現多元參與與公民監督精神。執行委員會為無給職，由董事會選舉產生，負責推動基金會中長期政策與計畫。辦公室則為常設行政單位，負責基金申請、計畫審核與專案管理<sup>8</sup> (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 n.d.a.)。

此外，SED 基金會另設有兩個專業諮詢委員會：「社會性處理／受害者與紀念諮詢委員會」 (Fachbeirat Gesellschaftliche

---

<sup>5</sup>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in Deutschland“ (1992–1994), “Überwindung der Folgen der SED-Diktatur im Prozess der deutschen Einheit“ (1995–1998).

<sup>6</sup> SEDDiktStiftG § 2.

<sup>7</sup> SEDDiktStiftG § 3, § 4.

<sup>8</sup> SEDDiktStiftG § 5 ff.

Aufarbeitung/Opfer und Gedenken) 以及「學術諮詢委員會」(Fachbeirat Wissenschaft)。這些委員會由來自學術界、受害者組織、媒體與公民社會的專家組成，在基金會的策略規劃、專案審核與資源分配等層面提供建議與審議意見，強化基金會與外部社會的連結與回饋機制。例如參與國際交流計畫的獎助金遴選、協助評估學術研究與出版計畫的申請。這些委員會的設置，體現了基金會在制度層面上納入多元聲音與專業知識的努力，並促進了轉型正義工作的透明性與公信力。

## (二) 主要工作

而 SED 基金會的核心工作為教育、紀念與研究，為達成基金會宗旨，依法可採行的措施包括：「舉辦本基金會自行主辦的活動、出版刊物，或其他針對 SED 獨裁統治進行政治、歷史啟蒙的貢獻；財務補助第三方之研究計畫，以及培育青年學者，特別是透過提供獎學金的方式；頒發獎項，以表彰在符合基金會宗旨下具特殊成就的新聞出版、學術研究或藝術創作；籌辦紀念日活動，緬懷德國分裂時期、反對運動與抵抗行動，以及 SBZ 與 DDR 獨裁統治下的受害者<sup>9</sup>」。實際運作上，為人所知地，基金會每年資助多項計畫，範圍遍及聯邦各邦，成為全國與地方記憶場域與民間團體的實質支柱 (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 n.d.b.)。

根據 2025 年度補助資料 (Projektförderung 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 2025) 顯示，SED 基金會共資助了超過 220 件專案，涵蓋德國全境及若干跨國項目，總金額達數百萬歐元，展現其在推動歷史記憶與民主教育上的資源厚度與制度能量。從類型來看，單

---

<sup>9</sup> SEDDiktStiftG § 2 (3).

是柏林一地便有超過 50 件補助案，範圍橫跨展覽策劃、多媒體教材、出版補助、見證人工作坊與青少年教育活動，其中單一專案金額最高者達 149,615 歐元，如由「柏林歷史協會」（berlinHistory e.V.）提出的數位導覽計畫，亦有眾多金額在 3 萬至 5 萬歐元之間的中型文化與紀錄項目。

若以補助主題分類，超過四分之一為教育與青少年相關計畫，反映出基金會在「代際記憶傳承」上的持續投入；另有約 20% 為展覽與紀念空間建置，亦有不少計畫聚焦於女性記憶、少數群體經驗或過去體制暴力的重探。地區分布方面，除了柏林之外，薩克森（Sachsen）與圖林根（Thüringen）等前東德邦也為補助重點，顯示出基金會資源配置上的歷史地理敏感度。此外，「記憶工作」（Memory Work）等國際合作計畫亦涵蓋柬埔寨、烏克蘭等地，顯示其在國際轉型正義網絡中的實質參與。

除了資助業務外，由 SED 基金會自行辦理的業務，具體還包括：發行刊物、推動研究、建立檔案館與資訊服務、發展數位記憶平台、推動青年教育與教師研習、設立見證人網絡、舉辦跨領域論壇與年度歷史交流會（Geschichtsmesse）、推動訪團等。

就發行刊物部分而言，基金會委託和發行各類出版物，如史料資料集（Stiftung Aufarbeitung, 2000）、學術論文集、教育手冊等，為學界和公眾提供可信資料。

基金會也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例如與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和柏林洪堡大學合辦「柏林冷戰研究中心」（Berliner Kolleg Kalter Krieg），促進對冷戰史和東德歷史的深入研究（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n.d.）。而以歷史交流會為例，匯集歷史學者、教育工作者、青年和公民團體，交流關於東德獨裁和民主

轉型的研究成果與教育經驗。而其特別設立之「當代見證人辦公室」(Zeitzeugenbüro) 整合來自全德的歷史見證人資源，提供教育機構與研究單位運用 (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 n.d.c.)。透過這些自辦工作，基金會充當知識樞紐的角色，將史料轉化為公眾可及的記憶資源。

此外，基金會自 2017 年起設立卡爾-威廉·弗里克獎 (Karl-Wilhelm-Fricke-Preis)，每年頒發給在揭露獨裁歷史與促進民主文化方面有突出貢獻的個人、項目或機構，以表彰他們在自由、民主與公民勇氣領域的卓越投入。該獎項主獎金額為 2 萬歐元，曾授予諸如俄羅斯「紀念」(Мемориал) 人權組織、東德異議人士弗蕾亞·克里爾 (Freya Klier) 等國內外人士與團體 (Tagesspiegel, 2015)。

### (三) 近期發展

若分析近期工作狀況，以已出版之最新一期工作報告——即 2023 年的 SED 基金會工作報告而言，2023 年適逢 SED 基金會成立 25 週年，該年工作重點環繞在強化歷史記憶教育、支持地方與跨國記憶工程、及面對極權遺緒與民主挑戰的社會對話。以「東德 1953 年 6 月 17 日全國性起義 70 週年」為主軸，基金會推出多場展覽、紀念活動與對談平台，包括廣受各地教育機構採用之教學展板「袖珍 6 月 17 日」(17. Juni kompakt) 與影音教材「東德幕後」(Backstage DDR)。同時，SED 基金會持續經營「當代見證人辦公室」與「青年記憶」(Jugend erinnert) 之參與計畫，並於 2023 年支援 124 項公民社會與研究機構的歷史記憶與教育行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基金會積極深化其國際合作網絡，特別

表示在亞洲地區的跨國記憶對話有所拓展：2023 年 10 月，基金會代表團與德國聯邦議會學術顧問團共同出訪台灣，與在地機關、研究機構與轉型正義實踐者就威權歷史的記憶工程、法制度安排與公民參與模式等，進行深入對話與經驗交流。這些行動不僅延續了基金會「以記憶深化民主」之宗旨，也展現其作為連結德國歷史經驗與全球轉型正義實踐的平台角色（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 2024）。

#### （四）小結

如此看來，SED 基金會之制度設計與運作機制，使之不僅成為聯邦政府推動記憶政治的重要執行單位，亦可視為「連結國家決策與民間行動的制度橋樑」。基金會一方面將國會與政府對歷史反思的政治承諾，轉化為可持續的各種專案機制，另一方面則整合性地支持地方團體、教育機構與個人主體進行歷史處理與民主教育之工作。亦即，雖然補助也是一大重點，但透過串連從政府到民間的不同資源，SED 基金會的運作模式構築出了一套制度性協作之架構。這樣的結構，證明基金會不僅提供穩定資金，更以具策略性的分配設計，將國家資源有效導引至多元社會行動者與歷史主體之間，發揮平台型中介角色。其運作模式可視為一種「導引式」協作治理範例，透過資源的擴散與主題引導，形塑出民主轉型下持續性的記憶實踐。

## 二、 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EVZ 基金會）

### （一）設立與營運基礎

EVZ 基金會根據由德國聯邦議會全數政黨支持通過的《設立「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法》（Gesetz zur Errichtung einer 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 EVZStiftG），於 2000 年 8 月正式設立。該法案標誌著德國在歷史政治與法理層面的重要轉捩點——確立國家與企業應共同對納粹統治下的強迫勞動與其他暴行之受害者，負起道德及法律責任（EVZ, n.d.a）。

具體而言，基金會設立之宗旨，主要包括兩個法定的核心任務：首先，透過合作組織提供財務資源，以向曾在納粹時期遭受強迫勞動及其他不正義對待的受害者提供補助；其次，基金會內部設立「記憶與未來基金」，其長期任務係以該基金收益支持有助於國際理解、納粹政權倖存者權益、青年交流、社會正義、有關極權與暴力體制威脅之記憶傳承，以及人道領域國際合作的各類計畫。同時，為緬懷並致敬那些未能倖存的受害者，基金亦支持有助於其後代權益之行動與專案<sup>10</sup>。

實則，EVZ 基金會的創立，源於對納粹強迫勞動制度長期忽視與未補償的歷史反省。根據估計，1939 年至 1945 年間，德國本土與其佔領地共有約 2,600 萬人被迫從事勞動，其中許多人在非人道條件下工作，甚至因此喪命。儘管戰後德國曾與多國簽署「全球協議」（Globale Vereinbarungen）進行間接補償，且部分企業與猶太索賠會議（Jewish Claims Conference）展開補償對話，但絕大多數個別的被強迫勞動者始終無法獲得直接承認與金錢賠償。直到 20 世紀末，受害者補償重新進入德國與國際公共討論領域。1998 年，德國聯邦議會啟動政治協商，並與美國及六個受害者主要國家

---

<sup>10</sup> EVZStiftG, § 2.

共同在 2000 年 7 月簽署政府間協議<sup>11</sup>，決定建立具有法律保障的基金會架構，促成德國企業積極承擔歷史責任，而非消極等待受害者提起之集體訴訟。而基金會的啟動資本，共計 101 億德國馬克（約合 52 億歐元），由德國政府與企業界各出資一半（EVZ, n.d.a），相當具有象徵意義。

EVZ 基金會依法採取雙層治理結構，由監督委員會（Kuratorium）與基金會執行委員會（Vorstand）共同構成其核心機構。監督委員會為最高決策機關，成員共 27 人，來自德國政府、聯邦議會、企業界、國際合作夥伴及受害者組織代表，包括聯邦總理任命的主席、德國聯邦議院與參議院代表、外交與財政部官員、美國、以色列、波蘭、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捷克等政府代表，及猶太索賠會議、羅姆人團體、聯合國難民署與國際移民組織等指定代表，體現其治理結構的國際性與多元性。監督委員會負責預算、年報、資助政策與基金使用指導方針，並有權根據基金會執行委員會建議，決定「記憶與未來基金」所要資助的專案<sup>12</sup>。

## （二）主要工作

自 2001 年 6 月起，EVZ 基金會透過 7 個國際合作組織（如猶太請求協會、國際移民組織、德捷未來基金會等）展開補償金支付，至 2007 年止，總計支付 44 億歐元予全球 98 國、超過 166 萬名原強迫勞動者及其合法繼承人，另支付約 2.7 億歐元予其他受害群體（EVZ, n.d.a）。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補償作為初期階段的主要任務，EVZ 基金

---

<sup>11</sup> EVZStiftG, Prämbel.

<sup>12</sup> EVZStiftG, § 5, § 6.

會也進行其他類型之活動，推廣記憶文化。例如，與柏林自由大學、德國歷史博物館合作，在 2005-2007 年間訪談了來自 26 個國家近 600 位強迫勞動倖存者，建立了龐大的數位口述歷史檔案館「強迫勞動 1939-1945」(Zwangsarbeit 1939-1945)，集合了倖存者影音證言，同時透過與德國聯邦檔案館的合作，整合了 13 國相關檔案文獻資料，為研究納粹強迫勞動開創了便利的數位平臺 (Zwangsarbeit Archiv, n.d.)。

### (三) 近期發展

2007 年補償任務完成後，EVZ 基金會更明確轉型為長期推動歷史教育、人權倡議與青年參與的公共基金會，國際取向更加明確。其當前使命在於：保存納粹迫害記憶、於當代承擔歷史責任、並面向未來世代推動形塑記憶文化。基金會透過資助模式與主動發起行動，支持跨國教育交流、數位歷史平台、邊緣群體倡議等。而其運作，亦延續創設初衷，以國家、企業與公民社會三方協力為基礎，成為記憶文化的中介節點 (EVZ, n.d.a)。

2021 年，EVZ 基金會在面對歷史事實知識下滑、政治操弄加劇、以及線上線下種族仇恨與歧視行為上升的挑戰下，啟動了其未來發展的戰略重整計畫「未來議程：策略再出發」(Agenda for the Future: Strategic Departure)。該策略聚焦於如何在當代與未來世代中，深化對納粹迫害歷史的記憶、實踐責任與行動。基金會在此新架構下重新定義其核心任務，不僅延續對納粹倖存者與其後代的支持，更進一步將青年教育、多元社會倡議與公民社會能量納入其治理策略。重點目標包括促進對歷史的批判性認識、抵抗反猶主義與針對羅姆人的歧視、鞏固平等尊嚴與權利的價值觀，並強化自組織的行動力。為此，EVZ 基金會建立了以「教育」與「行動」為

核心的資助領域與主題群組 (clusters) ，並推出線上平台「EVZ 學院」 (EVZ Academy) ，作為推動學習、交流與數位網絡建構的新型場域。整體而言，EVZ 基金會透過此議程將其記憶使命具體化為一套具前瞻性、參與性與數位導向的資助與合作模式，回應近年轉型正義面臨的社會與技術挑戰。

以網絡建構而言，EVZ 基金會在近年來積極推動多元網絡與國際合作，展現其作為公民社會平台與記憶治理樞紐的角色。其所參與並主導的網絡包括：「以色列網絡」 (Netzwerk Israel) ，自 2023 年哈瑪斯襲擊事件後成立，旨在支援以色列境內受害者與倡議和平共處的民主公民社會團體；由獨立智庫「iRights.Lab」發展的「數位集體記憶」 (Digital Collective Memory, DCM) ，則是一個以數位記憶為主題的參與式平台，吸引來自歐洲與全球超過 400 位使用者註冊交流。此外，EVZ 基金會也是「全球轉型正義學習中心」 (Global Learning Hub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的一員，該平台由伯格霍夫基金會 (Berghof Foundation) 主持，獲德國聯邦經濟合作暨發展部 (BMZ) 資助，目的在於匯聚全球轉型正義經驗 (EVZ, n.d.b) 。

針對戰爭與迫害倖存者的緊急支援，EVZ 基金會亦自 2022 年起與約 50 個德國紀念機構與博物館合作，建立「烏克蘭受納粹迫害倖存者援助網絡」 (Aid Network for Survivors of Nazi Persecution in Ukraine) ，不僅支援烏克蘭，亦協助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長期合作機構，保存檔案並維繫其運作。此外，基金會與德法青年辦公室 (DFJW) 及德以未來論壇 (DIZF) 合作推動雙邊青年公共議題交流，如共同記憶、氣候與安全等主題。此外，EVZ 基金會也是「#信任創造影響」 (#VertrauenMachtWirkung) 與「透明公民

社會倡議」 (Initiative Transparente Zivilgesellschaft) 之簽署機構，並自 2022 年起成為柏林基金會週 (Berliner Stiftungswoche) 與柏林基金會聯盟 (Bundesverband Deutscher Stiftungen) 成員，藉此強化其與城市基層倡議間的連結。

戰爭背景下，EVZ 基金會啟動「危險中的行動者夥伴計畫」 (Activists at Risk Fellowship)，為因在烏克蘭、白俄羅斯與俄羅斯倡議民主與和平而面臨威脅之行動者，提供三個月的庇護與行動空間，2023 年共支持 19 位人士參與 (EVZ, n.d.b)。

#### (四) 小結

如慕尼黑與上巴伐利亞猶太社群主席 Charlotte Knobloch 所言：「對於受害者而言，對其所受苦難的承認與金錢補償一樣重要。」 (EVZ, n.d.a) EVZ 基金會體現的不只是補償制度，更是對歷史傷痕的制度性回應與轉化機制，其不僅扮演記憶工程的資金處理者角色，更可視為、或者說轉型為「行動網絡的策動者與中介平臺」，當前不僅接受申請、發放補助，更主動規劃與串連不同國家、世代與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及網絡。

### 參、 協作之實踐方法

上述的簡介大致描述了兩基金會之基礎資訊，並提供若干行動實例，包括近期主要工作狀況，實可發現，SED 基金會和 EVZ 基金會的角色，是執行國家對於記憶文化等目標之推動，然而避免了直接以「國家」的身份 (包括組織形式、資金來源) 進行政策引領或執行，並盡可能地在不同的工作專案中容納民間的能量，可謂是扮演了「串連」的中介者角色——透過基金會的業務，國家和民間

社會得以在不同形式的專案中開展「協作」。

以下，本文將以兩基金會的工作方法為核心，進一步分析其串連角色在協作的關鍵地位，包括了「主動」與「被動」面向，以及類型化地討論國家與公民社會在基金會的串連下有何具體的協作方法，以便建構對於協作工具箱之想像。

## 一、 兩基金會之「串連」角色

### (一) 主動

主動串連，展現在兩基金會「主動設計合作架構」之工作模式，即設計了多項合作平台與倡議性制度，這不僅將民間資源與政府政策結合，更進一步在協助公民社會形成合作網絡，有助於多元交流與資源整合。

以 SED 基金會為例<sup>13</sup>，在此以三個持續性的工作說明其主動串連的角色：其一是前述的歷史交流會（Geschichtsmesse），這場專業年會聚焦於德國分裂與統一之歷史在歐洲脈絡下的意涵，並吸引來自全國超過 300 名來自學校、紀念館、公民教育機構、歷史協會與學術單位的參與者<sup>14</sup>。該交流會亦介紹多項教育計畫、創新展覽與多媒體出版品，持續作為德國記憶政策與歷史教育的重要交流樞紐。

此外，與國內外機構的合作是 SED 基金會工作的重要基石。多年來，基金會已建立起一個穩定的「國際合作網絡」，涵蓋專責處理各國共產獨裁歷史的紀念館、博物館與研究機構。這些夥伴來自政治教育（概念接近我國之公民教育）、歷史記憶、政治基金會、

---

<sup>13</sup> 本段落之活動參照 SED 基金會網站之報告。

<sup>14</sup> 2025 年歷史交流會於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舉行，主題為「什麼是德國？統一與多元——德國統一 35 年後的歐洲視角」。論壇聚焦當代德國社會與民主在全球挑戰、數位化與社會多元化下的變遷，透過座談、朗讀與展覽等形式探討「統一社會」的延續性與轉變、東西德經驗差異、民主制度現況、歐洲共通記憶等議題。

聯邦與各邦政府機關、學校與民間團體。透過與超過 200 個合作單位的密切聯繫與交流，基金會在地方、全國與國際層次持續深化其記憶與教育實踐，也為每年所資助的眾多合作專案提供扎實的支持與平台。這種多層次的夥伴關係，已成為基金會推動歷史反思與建構民主意識的重要基礎。

而其中有一項持續進行的跨國合作專案：「記憶工作」國際交流計畫。該計畫旨在促進國際間處理極權與國家暴力歷史經驗之機構與人員的交流與合作，特別針對從事轉型正義、歷史記憶、政治教育與紀念實踐之組織與團體（如紀念館、博物館、檔案單位與 NGO），提供短期實地交流的資金支持。透過該計畫，德國的機構可申請為期一至三個月（最長可達六個月）的交流獎助金，赴海外合作機構參訪；亦可資助海外合作機構人員赴德參與交流，雙向建立學習與合作機制。申請者須為德國境內機構或個人，計畫合作方須至少有一方為處理共產極權歷史領域之機構。計畫不開放給學術研究單位與研究性旅行，目的在於強化實踐經驗與民間機構間的橫向連結。此計畫不僅支持具體合作，也致力於建立長期網絡。參與者可在交流期間與當地更多機構接觸，拓展合作機會。基金會強調，記憶的民主化與轉型正義的全球對話，不應侷限於國家內部，而需建構跨境夥伴關係，發展「互學—共構」的實踐模式。

其三，SED 基金會自 2005 年起舉辦年度「研究考察之旅」（Studienfahrten），目的在於促進國際間對威權體制與轉型正義經驗的理解與交流。該計畫邀請來自德國各研究機構、紀念館、媒體與政治領域的專業人士，前往曾經歷共產或極權統治的國家，實地了解當地歷史背景及其記憶實踐方式。透過考察與對話，促進跨國協作與未來合作的孵化。基金會迄今已前往包括阿爾巴尼亞、保

加利亞、波羅的海三國、俄羅斯、西班牙、塞爾維亞、摩爾多瓦與烏克蘭等國。

其中，2023 年更首次以台灣為對象，進行第 19 次研究考察之旅，與台灣學界、民間記憶團體與相關轉型正義機構互動交流，深化彼此對民主化與歷史記憶工作的相互理解。基金會強調，這些研究旅行不僅是知識與經驗的共享，更是建立國際轉型正義對話平台、尋求共同課題與合作可能的實踐行動。

從以上三種主動構建的平台與網絡，可以看出 SED 基金會搭建了民間資源交流整合的空間與機會，並融貫國家政策推動之目標。而 EVZ 基金會則建構機會，使「以色列網絡」、「全球轉型正義學習中心」、「危險中的行動者活辦計畫」等倡議網絡得以穩定存在，強調跨國、弱勢與危機情境下的連結性，主動地創造資源整合的可能<sup>15</sup>。

## （二）被動

兩基金會亦建立了開放性補助制度，透過如一般性的專案資助（Projektförderung）制度、「青年記憶」及各類獎助金機制，使來自學術界、教育單位與地方團體的提案得以被受理與資助。以東德基金會而言，根據其資助原則（Fördergrundsätze），資助與否的決定由董事會作成，董事會在法律所賦予的自由裁量範圍內，考量資助政策之優先事項，就個案作成批准與否的決定。而董事會在決策過程中，可徵詢獨立專家之意見；但若為高於 6 萬歐元之專案，則應予徵詢。此外，具體決定也會繫諸可支配補助資源之多寡。而

---

<sup>15</sup> 如果比照兩基金會的網站架構，可以發現 SED 基金會更強調許多主動串連的活動專案，而 EVZ 基金會仍將補助放於網站結構的核心，不過，EVZ 基金會同樣也有諸多網絡、平台專案，串連國家與民間的不同資源，如本文所述。

各類計畫在被審查與選定後，進一步被導入制度化的管理流程中，其執行進度與成果品質亦持續受到監督與評估。藉由這樣的程序，資源的使用被導引進入結構性協作場域，成果也被轉譯為更具公共性與延續性的記憶實踐成果。

### （三）主動與被動融合

在此，值得另對兩基金會皆有涉及的聯邦計畫「青年記憶」加以補充說明，雖然這主要是資助申請的設計，但可以窺見兩基金會的串連可能同時具備被動與主動的性質。

以 SED 基金會而言，聯邦計畫「青年記憶」之「德國統一社會黨之不法」（SED-Unrecht）資助計畫（Förderlinien），旨在推動與青年共同開發創新的歷史教育形式，聚焦於東德專制統治、德國分裂與統一的歷史經驗。該計畫鼓勵 12 至 27 歲之年輕世代批判性地反思德國歷史及其當代影響，進而強化民主認同與促進多元包容。被資助的專案涵蓋共產專制時期的生活、青年的反抗與次文化經驗、以及跨國視野下的分裂與遷徙記憶。計畫同時致力於建立轉型正義機構、教育機構、文化場域與青年組織間的合作網絡，使歷史教育不僅成為傳遞知識的場域，更成為跨世代公共協作與民主實踐的平台。

而以 EVZ 基金會的部分而言，「國際青年記憶」（JUGEND erinnert international）是由德國外交部資助的國際青年歷史教育補助計畫，旨在透過跨國學習促進年輕世代對納粹迫害與歐洲記憶文化的批判性理解。該計畫自 2023 至 2025 年間執行，主要資助德國、歐洲與以色列的紀念館、教育機構與非政府組織，鼓勵發展具有創新性與跨文化對話潛力的合作專案。資助計畫分為三大類型：

「數位歷史『再』創造」 ([re]create digital history) 著重以低門檻之數位工具再現納粹暴行之歷史場所；「尋找記憶『再』行動」 ([re]act finding memories) 以 14 至 35 歲青年為對象，支持多邊記憶對話與專業交流；「記憶場所『再』形塑」 ([re]shape places of memory) 則聚焦中東歐、東南歐與波羅的海國家的歷史記憶場所，強化其在歐洲記憶文化中的轉譯與教育功能。透過該計畫，EVZ 基金會不僅支持記憶工作的國際化，也促進青年參與、數位創新與邊緣地區的歷史聲音得以被聽見。

實則，兩基金會雖具有提供補助之機構定位，實際上所建立的制度設計亦讓申請單位被納入一套合作性的機制之中、連結其他專案之公民社會資源，創造更多可能。

## 二、 具體方法：協作工具箱建構

行文至此，本文已提及兩基金會運作的多項具體實踐與專案設計，以下將嘗試透過類型化的方式，進一步建構出可供觀察與應用的「協作工具箱」想像，並初步聚焦於四種方式：行動協作、教育與推廣之協作、受害者支持協作、以及數位時代之協作新嘗試。需要先行指出的是，雖然本文依據協作形式進行分類介紹，然實際上的專案推動往往涉及多重面向，單一工作類型也可能同時涵蓋數個協作模式，並同時具備主動與被動面向，彼此並非絕對區分，而應視為彼此交織的實踐向度。

### （一）行動協作

首先，在協作模式中，「行動協作」指涉承載著國家政策方向

的基金會，直接塑造特定行動，以不同方式和公民社會進行互動，體現基金會主動性與價值導向的重要形式。此種協作在公民社會之合作對象主要包括議題工作者，而其互動關係不僅止於回應申請或提供資金，更展現出基金會主動塑造社會參與議題與方向的積極角色。具體來說，行動協作在此指的是「發起某種框架」，邀集公民社會應募或參與的工作方式。

舉例而言，SED 基金會的歷史交流會便可說是此種類型，透過舉辦年度定期會議，創造了對議題具有共同關心者交流溝通之平台。

另一種類型如特定獎項或資助的設置。如 SED 基金會自 2017 年起設立的「卡爾-威廉·弗里克獎」即為典型例證。該獎項每年表彰對揭露極權壓迫、倡議民主與自由有傑出貢獻的個人或團體。2023 年獎項頒發予蘇聯古拉格沃爾庫塔勞改營之倖存者協會（Lagergemeinschaft Workuta / Gulag Sowjetunion），及長期關注東歐異議文化的記者 Doris Liebermann，象徵對跨世代與跨國記憶工作的肯認與延續。同樣展現行動協作精神的，還有 EVZ 基金會設立的「危險中的行動者夥伴計畫」。

此外，SED 基金會持續推動的年度國際研究考察之旅計畫，亦可歸類為此類型。包括前述 2023 年 SED 基金會組織了不同來自不同相關工作或倡議團體之代表團前往台灣，實地了解台灣的轉型正義制度與公民社會實踐，拓展德國記憶政策與亞洲民主經驗之間的對話空間。

這些「行動協作」案例，無不展現兩基金會作為「參與框架設計者」與「行動價值引導者」的積極定位。

## （二）教育與推廣之協作

第二種類型，「教育與推廣之協作」可謂記憶工作相當核心的實踐面向之一。這種類型的協作對象，在公民社會所涉及的是學生、教育者、或一般大眾。相較於單向的知識傳遞模式，兩基金會更致力於創造一種多方參與、跨世代、跨領域且具公共性的教育場域。前述關於 SED 基金會所設立的「當代見證人辦公室」便是相當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該平台匯集了超過 300 位歷史見證人之資料，並提供給全國學校、紀念館與公民教育機構使用，使青少年能透過面對面或數位方式，直接與親歷者進行代際對話，深化對極權統治與抵抗歷史的理解與感知。也就是說，不同於單純的單向接受知識，青少年或一般公民在此平台也可以有對話的可能，直接參與了記憶的延續與形塑。

另一方面，「青年記憶」計畫則體現出制度化協作的教育設計。國際版「國際青年記憶」如前所述的三支資助計畫：「數位歷史『再』創造」、使國際青年對話的「尋找記憶『再』行動」、東歐的「記憶場所『再』形塑」，進一步將記憶教育推向跨文化與多語情境。這些專案不僅強化了歷史教學的多樣性與當代性，更逐步建構起記憶教育的跨國網絡。

此外，針對數位原生世代，SED 基金會推出的「東德幕後」影音教材系列，結合動畫敘事、歷史圖像與證言資料，透過簡明的影片形式讓年輕人能以可親的方式進入 DDR 歷史脈絡。此計畫同時回應「誰的記憶、如何呈現」的議題，也顯示 SED 基金會作為教育平台設計者的深度角色。

整體而言，教育與推廣之協作使 SED 基金會從記憶內容的供給者，轉化為協作式公共學習的促進者與場域構築者。

### （三）受害者支持之協作

對於受害者的支持，基金會的相關工作並非單一補償制度，也包括其所建立的「受害者支持協作」——透過制度化合作機制，將「脆弱者」納入可見與可支援的公共結構之中。以 SED 基金會為例，其早在 2000 年即與多個地方受害者協會合作編撰《受害者諮詢指南》（Stiftung Aufarbeitung, 2000），建立德國全國性的諮詢網絡地圖，協助曾遭政治迫害者在法律、心理與社福層面獲得可近的協助資源。該協作模式不僅提供導引性資訊，更深化了受害者群體在制度中的位置感與可及性。

此外，SED 基金會也逐步推進對創傷性經驗的公共化處理。2023 年基金會報告中特別提及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相關的系列倡議與出版行動，強調歷史傷痕不僅需被記錄，更須被療癒與承認。這類工作不僅仰賴法律與紀念層面的正當性建構，更需醫療、教育、社工與民間組織之間的跨專業合作。在此意義下，受害者支持並非單純的個別照護，而是一種具有公共性與修復性的協作體系——一種使記憶工作與人之尊嚴重新對接的照護型記憶連結。

### （四）數位時代之協作新嘗試

本文希望指出的第四種協作工具，可謂是數位時代的新型態，這不僅涉及單純的形式的改變（亦即從實體活動變為線上等），更包括了對於協作本身內涵的改變，也開啟了去中心、開放式、多語言參與等不同可能。

在數位脈絡中，以形式的進展而言，針對一般社群及青少年族群，SED 基金會推出的「袖珍 6 月 17 日」與「東德幕後」等多語系數位教育資源，兼顧歷史內容的準確性與數位可及性的平衡。這

些教材不僅支援障礙族群的無障礙閱讀與視聽學習，也透過動畫與敘事影片等形式，建構出親民而精緻的歷史敘事形式。而 SED 基金會亦在「當代見證人入口」（Zeitzeugenportal）<sup>16</sup>的建置上展現高度整合性。該平台並非由基金會單方面製作完成，而是透過與學校、博物館、教育工作者與地方見證人團體的協力合作，共同蒐集、策劃並製作影音口述史資料，結合教學手冊與互動教材，形成一個跨機構、多功能的記憶知識庫。

目前，平台集結了數百位歷史見證者之影音口述史、教學手冊與互動素材，並支援跨平台教學應用與公共展示，擴展了數位記憶資料的可用性與流動性。此外，更進一步地，先前曾提及之 EVZ 基金會參與發展的「數位集體記憶」平台即為一代表性實例。該平台由「iRights.Lab」經營，目前已匯集逾 400 位來自德國與國際的記憶工作者，提供一個橫跨語境、文化與機構邊界的共享數位空間，鼓勵參與式策展與資料交換，成為典型的「數位轉譯協作」場域。

這些數位實踐同時也突顯了記憶工作在當代表達面向的潛力。在此意義下，兩基金會不僅是歷史的保存者與策展者，更成為「開放平台」的嘗試者，努力在協作中重構記憶權的使用、傳遞與共創規則。數位時代的記憶治理，正逐步由中心化的國家敘事轉向群體參與的共構網絡，而基金會正是促成此一轉變的重要樞紐。

## **肆、從德國兩基金會經驗看協作之可能與挑戰**

### **一、協作之意義與可能性**

從德國兩基金會的實踐經驗來看，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協作」

---

<sup>16</sup> Zeitzeugenportal, <https://www.zeitzeugen-portal.de/>（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3 月 1 日）。

並非僅為透過基金會進行資源分配的技術性執行機制，而是一種具有治理意涵的制度實踐方式。兩基金會所展現的，是以「協作式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為核心的制度運作邏輯（Ansell and Gash, 2008）：透過結合國家、地方、公民社會、教育機構、國際夥伴等多元行動者，共同參與記憶建構、歷史教育與民主推廣等轉型正義任務，並在這一過程中建構「制度化共構網絡」。在此結構中，兩基金會並非單純的國家政策執行單位，而是承擔起平台型樞紐角色，主動設計合作模式、串連資源流動並建構跨主體間的信任與共識。

德國兩基金會的協作模式之制度優勢可從數個面向具體說明。首先，在資源穩定性方面，兩基金會皆由聯邦立法設立，經費來源納入聯邦預算編列<sup>17</sup>，使其擁有不同於短期專案型資助的穩定結構。國家作為資源提供者，但不直接干預具體專案內容，而是透過基金會的「中介治理」角色，賦予地方與公民社會更大的參與空間與實作彈性。這種「穩定資源＋鬆動控制」的設計，不僅有助於創新實踐的產生，也讓記憶工作（基本上）能夠跨越政黨輪替與施政風向變動而持續推進。

其次，協作機制有助於提升社會參與與制度正當性。透過基金會開放型申請、共設議題、協力執行與成果公開等流程，不同行動者得以在制度框架中參與治理，建立對制度的認同與信任。這種由「資助者—受助者」轉化為「共同協作者—對話夥伴」的關係，也使治理權的行使更為分散而具正當性。

此外，在多元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下，知識產出與實踐策略也能夠經由對話與磨合，發展出更具包容性與多樣性的「集體智慧」

---

<sup>17</sup> 如前所述，EVZ 基金會設置時依其性質，有部分來自企業捐款。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Wise, Paton, and Gegenhuber, 2012), 呼應轉型正義工程中「由下而上」取徑之優勢 (Lundy and McGovern, 2008)。

再者，協作制度亦提升了制度彈性與危機回應能力。相較於中央集權型的單線執行體系，基金會的治理模式允許多重節點運作與平行網絡分工，使其在危機情境（如政治轉向、財務壓力或國際關係緊張）下仍能維持部分功能。以 EVZ 基金會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立即啟動支援烏克蘭、白俄與俄羅斯行動者的「危險中的行動者夥伴計畫」為例，即反映此種機構彈性與合作網絡基礎下的快速應變能力。

最後，協作制度亦體現了國家治理與民間能量之間的良性互補。政府提供規模性資源與制度保障，民間團體則貢獻在地經驗、文化敏感度與靈活執行力。透過基金會這一中介平台，兩者得以相互調適、對話與補位，共同推進轉型正義這類具有高度價值導向與社會複雜性的公共議題。在這個意義上，協作不僅是資源的合作，更是一種民主治理型態的深化實驗場。

當然，在民主面臨衰退、極右言論崛起、以及歷史修正主義興起的當代政治環境中，此一協作基礎亦受到挑戰。然而，也正因如此，基金會透過持續性的協作實踐，所建構出的「跨主體信任形成」與制度網絡，更可能成為當代社會維繫歷史責任、公共信任與記憶正義的重要支撐結構。

## 二、 協作面臨之挑戰

儘管德國兩基金會在制度設計與實踐推動上展現出豐富的協作經驗，其合作網絡與中介角色在過去約二十年間，也確實推動了多

項具代表性的記憶工程實踐，但若進一步反思其長期發展所可能遭遇的限制或張力，仍可觀察到一些潛在的挑戰與風險。這些挑戰未必在官方報告中被明確提出，亦尚缺乏系統性的學術討論，但從其治理模式、資源結構與協作實務中，仍可歸納出若干在制度持續性、社會參與深度與合作關係維繫等面向上的潛在困難。以下嘗試提出三個層次的分析方向，作為反思協作機制之限度與未來強化可能性的起點。

首先，從國家角色的角度來看，儘管兩基金會形式上均設計為去官僚化的公共機構，並透過治理團隊的多元組成機制納入來自民間、甚至國會與國際的代表參與，然而，國家的角色實則難以完全抽離——基金會之資源主要仍仰賴聯邦預算之撥付與聯邦機構的政策支持，國家在其中雖未直接干預專案內容，卻仍透過制度設計、議程設置與治理參與，對基金會的資源流向與議題焦點施加一定程度的影響力。若在德國政黨過去近二十年政治相對穩定的狀態下，此種制度安排尚能維持其平衡性與合作正當性；然而，隨著近期政治光譜明顯移動，或極端主義力量進一步滲入政策與預算過程，國家角色的再政治化將可能對協作網絡產生壓力，甚至削弱基金會作為相對中立與穩定平台的功能。

其次，在資源結構與實務操作層面，兩基金會儘管具備相對穩定之財政基礎，但其資源分配的結構性挑戰亦不容忽視。補助計畫的審查機制與資助對象如何達成公平，向來是挑戰。除此之外，即使在既有受補助者或納入的公民社會團體之中，亦可能存在不同群體的可及性落差，顯示在多元與平等參與之目標下，仍有可深化與修正之空間。

最後，在關係與知識共構的層面，協作所需面對的挑戰往往最

難以量化也最難以預測。轉型正義與記憶實踐涉及不同世代、地區與文化背景對歷史意義的詮釋與感受，而這些差異往往不會在協作開始階段即完全顯現，而是隨著實踐進程逐步累積與浮現。例如，在跨國交流與青年教育合作中，東西德記憶文化的落差、歐洲與非歐盟國家對納粹歷史或共產統治經驗的不同詮釋、甚至是社群內部對歷史再現語言的敏感度，皆可能影響專案能否建立共同語境並形成對目標之共識。這也導致部分協作可能停留於形式上的互訪與交流，而難以真正達成知識與敘事的共構。

進一步來看，若協作參與者未能持續維繫參與動能，或因回應國際議題而導致焦點頻繁轉移，也可能出現夥伴關係鬆動與社群信任流失的現象。此外，轉型正義作為「和時間賽跑」的工程，可以從兩基金會的實踐看出，目前的政策方向高度希望納入年輕世代的參與，以延續記憶文化的拓展與落實（例如，參照 2025 年 SED 基金會所補助之專案主題，超過四分之一與教育和青少年相關）。然而，世代差距不僅是因新興世代未曾經歷特定時代，更包括了不同世代在不同時空下，即面對著差異的政治社會條件與挑戰。記憶文化對於年輕世代而言的意義，恐怕還需要持續加以探索。

總結而言，基金會制度所提供的協作架構，確實開啟了轉型正義治理模式的另一種可能，顯示了國家和公民社會的可能關係——一種建立於社會信任、知識對話與資源共享之上的合作型態。然而，其內部亦蘊含了來自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制度設計邏輯與協作實踐動態等不同層次的張力。

當眼光回到台灣，未來在我國若欲使類似模式深化發展，或許也必須正視並釐清這些潛在的挑戰，進而在制度層面建立更具韌性與包容性的協作條件，讓「參與」不僅為制度修辭，而能轉化為轉

型正義過程中真正具備建構與回應能力的實踐核心。

## 伍、 結語

回顧本文所分析的德國兩基金會——SED 基金會與 EVZ 基金會——可以看到，這兩個制度架構雖各有其歷史背景與功能定位，但皆扮演了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樞紐，透過多方「協作」作為其實踐邏輯，逐步建立起橫跨國家、民間、地方與國際之間的制度網絡。從協作角色的類型化、具體操作方法到面臨的制度與實務挑戰，本文試圖描繪出一種制度性協作模式如何在記憶政治與轉型正義之中得以生成、維繫並發揮功能的輪廓。

若將此經驗與台灣目前的發展進行對照，或可見出若干啟發性張力。台灣在促轉會的進程下，完成政治檔案揭露、威權象徵處置與壓迫體制釐清等若干工作，但其運作邏輯與兩基金會主要的「記憶文化」推廣工作有所不同，仍是由國家主導實施多項特定之轉型正義任務。換言之，台灣在現況制度設計上，並非以德國兩基金會的「協作性記憶治理」模式為明顯特徵。

另一方面，從補償機制而言，台灣雖也曾由國家成立相關補償基金會，包括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下稱二二八基金會）與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近年並有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受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但其主要任務確實為補賠償工作，規模、資源基礎與任務期間皆與德國兩基金會之設定不同，且其工作多以國家單向承擔的方式出現，為社會各界可持續參與之協作平台則並非其主要任務。

不過，應特別說明的是，1995 年設立之財團法人二二八基金會，隨著其賠償作業邁入尾聲，也轉型為永久存續、教育推廣機構，並

自 2006 年起經營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做為人權交流平台，也辦理展覽、座談會、音樂會、影展、研討會、出版品及人權國際交流等各項多元活動，二二八基金會並設置有教育研究補助與教育推廣的教學手冊。因此，在基礎形式上，二二八基金會似乎與德國兩基金會有相當之映照可能性，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公民社會與二二八基金會的關係與互動，也更有與德國此種協作模式對話的可能性。

具體而言，本文希望指出德國兩基金會經驗可能為台灣帶來值得深思的幾點啟發。其一，協作性平台得以中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信任，使轉型正義不再侷限於特定時段或機構，而得以作為一項長期社會工程穩定推進；其二，在面對記憶多元與代際差異之際，制度化協作可促進知識共構與價值對話，有助於緩解轉型正義工作面臨的社會分歧；其三，基金會結構所提供的資源穩定性與跨主體參與機制，亦為歷史工作者與教育現場提供更具彈性與創造力的空間。

當然，任何制度經驗的轉用或類比都應謹慎以對。台灣與德國的歷史條件、法治背景、政黨文化與公民社會生態皆有所不同，協作制度之所以能發揮作用，也深受特定政治文化與治理傳統所形塑。若欲於台灣嘗試建構類似的記憶治理平台，勢必需要重新思考國家／政黨的角色、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可能、以及資源分配的公平。換言之，德國兩基金會經驗無法直接複製，也不應直接複製，但其所展現出的協作模式，仍為理解並構思台灣轉型正義後續發展時有價值的參照。

此外，在思考制度設計的未來方向時，也應正視公民社會本身所蘊含的豐富能量。無論是在歷史揭露、見證紀錄、教育推廣還是

創意轉譯等層面，台灣的公民社會已展現出相當程度的行動力與自發性，這些力量不應被視為治理之外的「外部資源」，而是民主制度內部應積極整合與支持的一環。如何讓這些實踐經驗與在地知識進入制度場域，並與政策目標與資源配置形成正向循環，正是台灣在後促轉會時代的當下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在此方面，德國透過基金會所建構出的制度化參與與協作機制，可謂提供了我們值得借鏡的方法工具箱。

### 參考文獻

- 吳乃德。2006。〈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  
《思想》2：1-34。
- 陳俊宏。2015。〈檢視台灣的轉型正義之路〉。《新世紀智庫論壇》  
71：18-28。
-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2015。《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  
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三冊）。台北：衛城出版。
- Ansell, Chris, and Alison Gash. 2008.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4): 543–571.
- 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2024.  
Tätigkeitsbericht 2023. Berlin: 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 Backer, David. 2003. “Civil Society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Possibilities, Pattern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3): 297–313.  
<https://doi.org/10.1080/1475483032000137108>

- Duthie, Roger. 2009. *Building Trust and Capacity: Civil Society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 Eppelmann, Rainer. 2000. "Die 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In *Zehn Jahre Deutsche Einheit*, edited by Wolfgang Thierse, Ines Spittmann-Rühle, and Jens L. Kuppe,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Gready, Paul, and Simon Robins. 2014. "From Transitional to Transformative Justice: A New Agenda for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8(3): 339–361. <https://doi.org/10.1093/ijtj/iju013>
- Gready, Paul. 2019. "Introduction." In *From Transitional to Transformative Justice*, edited by Paul Gready and Simon Rob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673478>
- Lundy, Patricia, and Mark McGovern. 2008. "Whose Justice? Rethink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from the Bottom Up."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35(2): 265–292.
- 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Ed.). 2000. *Übersicht über Beratungsangebote für Opfer politischer Verfolgung in der SBZ/DDR*. Berlin: 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 Teitel, Ruti. 1997. "Transitional Jurisprudence: The Role of Law i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e Yale Law Journal* 106(7): 2009.

Werle, Gerhard, and Moritz Vormbaum. 2022. *Transitional Justice*. Cham: Springer.

Wise, Sarah, Rob A. Paton, and Thomas Gegenhuber. 2012. "Value Co-creation through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n the Public Sector: A Review of US and European Initiatives." *VIN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 42(2): 251–276.

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 n.d.a. "Gremien." <https://www.bundesstiftung-aufarbeitung.de/de/stiftung/gremien> (accessed April 14, 2025).

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 n.d.b. "Projektförderung." <https://www.bundesstiftung-aufarbeitung.de/de/foerderung/projektfoerderung> (accessed April 14, 2025).

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 n.d.c. "Zeitzeugenbüro." <https://www.bundesstiftung-aufarbeitung.de/de/vermitteln/zeitzeugenarbeit/zeitzeugenbuero> (accessed April 14, 2025).

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 n.d.e. „Förderprogramm ‚Jugend erinnert‘.“ <https://www.bundesstiftung-aufarbeitung.de/de/foerderung/foerderprogramme/jugend-erinnert> (accessed April 14, 2025).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n.d. "Berlin Center for Cold War Studies." <https://www.ifz->

muenchen.de/en/research/berlin-center-for-cold-war-studies (accessed April 14, 2025).

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 (EVZ). n.d.a. "Gründungsgeschichte." <https://www.stiftung-evz.de/wer-wir-sind/geschichte/gruendungsgeschichte/> (accessed April 14, 2025).

Stiftung Erinnerung, Verantwortung und Zukunft (EVZ). n.d.b. „Initiativen und Netzwerke.“ <https://www.stiftung-evz.de/wer-wir-sind/stiftung/initiativen-netzwerke/> (accessed April 14, 2025).

Tagesspiegel. 2015. „Auszeichnungen: Karl-Wilhelm-Fricke-Preis – Bewerbungsphase gestartet.“ Der Tagesspiegel, April 13, 2015. <https://www.tagesspiegel.de/berlin/auszeichnungen-karl-wilhelm-fricke-preis-bewerbungsphase-gestartet-12764750.html> (accessed April 14, 2025).

Zwangsarbeit Archiv. n.d. “Cooperations.” <https://www.zwangsarbeit-archiv.de/en/projekt/kooperationen/index.html> (accessed April 14, 2025).